

再探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其原因^{*1}

陈洪模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江西南昌 330009)

【摘要】: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为了挽救革命而在短时期内先后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既有相似之处, 又有不同特点: 共产国际参与指导了这两次起义, 但指导思想和具体方式却有不同; 南昌起义由中共中央成立的前委领导, 秋收起义由中共湖南省委下属的前委和行委共同领导; 两次起义都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上的旗帜, 秋收起义明确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 南昌起义以北伐时期正规军为主, 秋收起义部队人员成分相对复杂; 两次起义的过程虽有差异, 但经历严重挫折之后寻找革命新道路的基本路径和结局大致相同。

【关键词】: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异同;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4—0024—09

1927年7月中旬, 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的面具, 公开宣布“分共”。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 挽救处于危机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 于8月和9月相继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两次相距甚近的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和特点。不少学者曾撰文对这两次起义做过分析比较,^②他们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两次起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 随着更多的史料得到披露, 笔者认为, 以往的研究或者对某些问题有所忽略, 或者某些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对这两次起义的异同再做一番比较探究, 提出一些看法, 以就正于党史界的同仁。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两次起义的关系

第一次大革命期间,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 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 实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以反对北洋军阀。当大革命面临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际, 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1]一方面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国际在“五月指示”中提出: “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 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 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 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2] (p229)} 共产国际的指示推动了中共中央领导对武装斗争的重视, 将陈独秀排除出中央领导岗位之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正是中共中央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 落实共产国际指示的重大行动。

¹收稿日期: 2017—02—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 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编号: JD1486); 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南昌起义国民报纸的收集与整理研究”(编号: 14DJQ05)

作者简介: 陈洪模(1951—), 男, 江西修水人,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南昌起义。

²①主要有: 桂玉麟“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历史经验”《江西社会科学》1997(7); 文正再“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比较分析”《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5); 张弛“三大起义与中共统战政策的转变”《传承》2008(9); 钟小敏, 黄国华“1927年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与三大起义比较研究——以旗帜和政权问题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

许多分析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之间关系的文章^③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关系。通过这些文章和相关原始档案，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联系。

中共中央于7月中旬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考虑到共产党所掌握的力量多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因此一度设想争取第二方面军首脑张发奎(此前张表现左倾)参加起义，并于7月19日派出李立三高级干部到九江实地考察形势。李立三等人到九江后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张发奎态度已经日益右倾，必须放弃对张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浔线举行起义。会后，派邓中夏回武汉向中央汇报，其他干部留在九江及附近筹备起义事宜。^{[3] (p76-77)}

有人认为南昌起义酝酿期间，“鲍罗廷支持南昌起义，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庐山会议，直接参与起义计划的制定，功绩是不小的”，^[4]并以此作为共产国际参与南昌起义酝酿的依据。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前未曾召开过庐山会议，仅仅是在九江先后召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九江会议后，李立三确实到庐山会见过鲍罗廷，并向他通报了准备在南昌起义的设想，得到了他的赞成，但不能以此作为召开过庐山会议的依据。何况此时共产国际新的代表罗明那兹即将到任，而鲍罗廷甚至等不及向罗明那兹详细交接，就要匆匆离开中国，他此刻怎么可能代表共产国际来指导南昌起义?有关详情可参考拙作有关论述，^[5]在此不赘述。

7月20日至25日之间，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常委得到李立三等主张在南浔线一带发动暴动的建议后态度积极。25日，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开会时都表示赞成这一主张。“当时虽没有详细讨论，可是已具体的准备一切暴动的需要。”^{[6] (p63)}但仅过一天，7月26日下午4时，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开会进一步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却说：“现在经费一时无着。又国际电，不许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6] (p64)}罗明那兹之所以改变态度，是因为他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最新电报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回复罗明那兹的电报中说：“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7] (p17)}并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8] (p6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表明，共产国际为防止南昌起义失败给苏联惹上外交麻烦，所以减少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并明确下令不准苏联人参与起义。同时由于担心起义力量不够，且对张发奎的革命倾向估计过高，共产国际还想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共中央派出张国焘前往南昌。张国焘到南昌后，在前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共产国际关于起义应争取张发奎以及如无胜利把握不如不进行暴动的指示，欲干扰起义的发动，结果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与会人员一致反对，最终张国焘接受了与会人员意见，赞成发动南昌起义。^{[6] (p65-66)}

张国焘在前委扩大会议传达时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消极因素，干扰了起义的进行，固然有张国焘无法推卸的个人责任，但共产国际本身对起义缺乏信心，发出的指示既可从积极方面亦可从消极方面理解，特别是要求继续争取张发奎，更是脱离了实际。应该承认，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的决策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南昌起义部队离开南昌远征广东以后，虽然一度设想争取国际援助，^{[9] (p352-354)}且共产国际也想给予援助，^[10]但客观上因起义军主力很快失利，共产国际一时也无法给这支远离海口的起义部队提供实质上的援助。而后来转战于湘赣边地区的秋收起义部队因为通讯联络、地理交通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主观上没有从共产国际获得援助的设想，客观上也没有获得援助的可能。

有学者认为：“在南昌起义胜利后建立的政权，以及南下撤退广东海、陆丰地区的选择等方面，起义的领导者们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11]这未免过于高估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指导作用。南昌起义胜利之后，8月3日起部队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离开南昌、远征广东，此后起义的领导机构与中央就失去了联系。李立三在南昌起义之后写给中央

³①主要有：钟小敏，黄国华“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0)；陈毓述，苏若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9)；熊燕“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之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周利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战略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09(9)；刘小花“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援助”《红广角》2010(11)；徐元宫“莫斯科对南昌起义前后态度变化原因考察”《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5)；肖燕燕“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学术探索》2012(7)。

的总结中曾经谈到与上级无法联络、信息不畅的情况：“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3] (p88)}起义部队在两个月行军途中既然同中央都无法接上联系，又怎么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

有关共产国际对秋收起义的指导可见罗章龙回忆。他说：毛泽东、彭公达到武汉去参加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麻园岭苏俄领事馆内召开了湖南省委会议。会上，“‘国际’代表提出要打倒陈独秀，大家感到突然。……易礼容认为不能提打倒陈独秀，并要求共产国际拨钱拨枪给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这个要求未答应，会议无结果而散”。^{[12] (p2)}这里所讲的国际代表其实就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领事马也尔。共产国际通过苏联的外交官员来介入中国的大革命，也是有先例的。例如发给驻武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五月指示”，收电人之一就是苏联驻武汉总领事普利切（化名柳克斯）。^{[2] (p298-300)}可见共产国际通过苏联驻长沙领事馆介入过秋收起义的筹划，至少在起义前为湖南省委提供过开会的场所。但是共产国际在起义筹备期间拒绝了湖南同志拨钱拨枪的要求，没有给起义提供具体的物质支援。作为旁证，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也提到马也尔曾经向湖南省委传达过共产国际的指示。^{[13] (p354)}起义发动后，湖南省委面对毛泽东领导的进攻长沙三路队伍失利、长沙城内敌军力量增强的严峻局面，于15日决定延期在长沙的暴动。马也尔于9月16日、17日先后给湖南省委写信，对起义应如何行动直接发出指示，批评省委15日延期暴动的决定。^{[14] (p66-67)}他在秋收起义后的一份报告还继续指责“九月十五日晚上省委决议长沙的暴动延期”，认为“湘东的事变以我看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失败”，要求“停止湘东已经退却的动作”。在严厉批评了湖南省委后，他甚至认为要由“派来的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15] (p68-72)}

由此可见，比起对南昌起义的宏观指导，共产国际或者说联共（布）对秋收起义的指导是微观的，是很具体很直接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通讯联络手段的关系。当时无线电台的联络尚未普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无法与起义部队通过电台直接联系，基本是靠人员联系。而当时恰好在长沙有苏联的领事馆，共产国际可以通过领事馆的电台下达指示，领事馆的马也尔则可以凭着外交官的身份活动，在长沙城内筹备秋收起义时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起义爆发后对城外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则鞭长莫及。至于南昌起义，无论在爆发地南昌还是南征目标地汕头，都没有苏联的领事馆，所以当南昌起义部队与上级无法联络的时候，共产国际自然无法通过中共中央也无法借助外交人员来对南昌起义施加影响。从具体指导的情况看，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指导有过动摇和犹豫，而对秋收起义的指导则表现出“左”倾盲动的倾向。

二、从领导层面看两次起义的异同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8月1日的南昌起义，还是9月间的秋收起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共为挽救大革命失败、推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艰辛努力，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南昌起义及秋收起义，从最初的酝酿到实施，从武装暴动的发起到组织领导，从起义的大计方针的制定到起义的演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结果。”^[16]从宏观角度看，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对这两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以及相关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还是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别。

首先，南昌起义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决定并发动的，而秋收起义是在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下举行的。7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派往九江的李立三等举行起义的建议后，“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罗米那兹、加仑、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给予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仑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17] (p174)}会上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前往九江、南昌，传达中央批准起义的决定并具体实施对起义的领导。由此可见，南昌起义的决策是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的。

从宏观方面来看，秋收起义也接受过中共中央的指导，因为它是中央部署的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中一部分。南昌起义后两天的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文件中就要求：“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18] (p12)}这是中央最早下达的一份关于秋收起义的文件，可以看出当时中央设想的暴动区域是在湘南。至于具体领导秋收起义的还是中共湖南省委，因为这份文件明确讲到“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八七会议”后的8月18日，改组后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召集第一次省委会议，选举常委，及讨论秋收暴动问题”。^{[19] (p111)}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后于次日向中央报告：“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20] (p14)}这时湖南省委设想的暴动还是全省暴动，但由于共产党当时在湖南所掌握的力量有限，确实无法在全省范围发动起义，于是湖南省委决定将暴动范围缩小。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最后确定“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常委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19] (p116-117)}会后，毛泽东衔命前往萍乡安源组织起义。从以上简单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秋收起义一直是处在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包括到前方具体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在省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的。

其次，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机构只有一个，即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而秋收起义则有所不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潘心源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中转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的话说到过：“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21] (p119)}可见在湖南省委之下有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这两个不同的领导机构来共同领导秋收起义。一份历史文件也证明了行动委员会的存在：“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民运动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22] (p64-65)}此文件的落款为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这清楚地表明了行动委员会与湖南省委一起指导了秋收起义的发动。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12] (p3)}从这段话看，前委和行委应为隶属关系。不过有学者认为“行委和前委一样，都是省委统一领导下对起义实施具体指挥的机构”。“行委的任务是直接指挥长沙及其周围各暴动地区的行动，主要是做好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整顿和组织长沙附近零散工农武装，破坏敌人铁路交通及电讯、水塔等设施，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在起义部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发动近郊农民和城内工人暴动，响应起义部队攻城。”^[23]照此分析，行委和前委就应该是平行的机构，而不存在行委领导前委。不管行委与前委的关系如何，我们谈及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时，绝不应忽视行动委员会的存在及其作用。

在具体比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个前敌委员会的级别、上级机关不同之外，还可以看到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两个前委中成员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是在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的，由周恩来担任。起义后几天中共中央一封信中谈到南昌起义部队即将南征广东时明确指出：“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天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24] (p39)}这封信清楚地说明中央指定的南昌起义前委成员，消除了后来的研究者在“前委成员问题”上的争论。相比之下，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只有书记毛泽东是明确的，前委成立时的具体成员有哪几位，并不是很明确。潘心源报告中转述毛泽东的话：“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这里虽然明确了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但对于前委成员具体包括哪几位军事负责人，无论是湖南省委的文件还是潘心源的报告均没有提及，只有一条“各军事负责人”为前委成员的规定，以致今天尚无法确认前委成立时有哪几位具体成员。所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记载秋收起义的前委这一机构时，也仅仅列出书记毛泽东，其他成员一概阙如。^{[25] (p1149)}

可见，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组成的，前委四位成员中有两位(周恩来、李立三)担任7月12日改组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加上30日赶到南昌的中央代表张国焘也是常委之一，所以南昌起义的领导层充分贯彻了中央的意图和指示。相比之下，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湖南省委领导，而湖南省委领导层对秋收起义发动的范围、中心等存在分歧，直到8月30日意见才统一，确定起义的范围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可是后来秋收起义实际是以湘赣边的修铜萍为主要地区。湖

南省委为了协调党和军队的关系，又分别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但因联络手段、方式等局限，行委和前委的配合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三、从旗帜看两次起义的异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旗帜概念做一个界定。笔者认为对旗帜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具体的旗帜，如一面军旗、一面红旗；一种是抽象的政治上的旗帜，即政治上的宗旨、路线等。

在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继续利用国民党旗帜、复兴国民党左派的设想，并作出了相应的宣传和部署。比如，南昌起义前两天（192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一方面批评武汉汪精卫集团：“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一方面又指出：“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的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26] (p98-100)}这里所讲的旗帜，显然是指政治上的旗帜，也可以理解为党的旗帜，而不是指军队打出的旗帜。

筹备南昌起义时，在九江的同志就根据中央指示，将暴动胜利后组成的权力机构名称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员中也有很多国民党左派人士，所以从政治上看打出的旗帜并未体现共产党的色彩。8月2日前委将参加起义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27] (p18)}此时的军队名称是国民革命军，军队旗帜也沿袭了武汉时期的旗帜。张太雷于9月下旬赶到汕头，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国民党这块招牌的指示。但因为当时前线战事紧张，未能及时调整。几天后因为汾水战斗失利，转移途中又遭到敌军截击，主力溃散，在组织撤退的流沙会议上，周恩来向大家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28] (p324)}而秋收起义部队所打出的军旗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29]与南昌起义相比，不仅军队名称不一样，军旗的不同更是一目了然，区别明显。于是有论者提出：“同南昌起义不同的是，秋收起义打的是共产党旗帜。当8月18日湖南省委研究秋收起义行动计划时，毛泽东坚决主张举共产党的旗子。他明确指出，不能再照‘八七’会议提出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秋收起义高举共产党的旗子，处处体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独立组织的原则，甚至连组建的部队也称为工农革命军，以区别于国民党时代的国民革命军。”^[16]这明显将秋收起义部队所打出的军旗与秋收起义所揭橥的政治上的旗帜混为一谈了。

从政治上分析，秋收起义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讲的那样“打的是共产党旗帜”。8月9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在乡村一切权利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利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30] (p307)}这里并没有“打出共产党旗帜”的意思，相反，还提出暴动指导机关应包括“民左分子”即国民党左派分子。8月18日湖南省委研究秋收起义行动计划时，毛泽东确实主张举共产党的旗子，但他和湖南省委的意见几天后就被中央否决了。中央复函批评湖南省委：“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13] (p353)}请注意这里“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的指令性语气。事实上，无论是湖南省委还是毛泽东都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政治上并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所以有学者认为：“准确的提法应当是，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在起义前曾经提出过在湖南秋收起义中打出红旗之事，但是，在起义的实际过程中，还是执行了中共中央左派国民党策略。……在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指导下的秋收起义，其起义名义、军队名称和政权机构名称完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起义旗帜当然应该与此相应。”^[31]这样的论述更符合历史情形。

那么在秋收起义中政治上的旗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文件。中央在8月下旬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在准备秋收

暴动时“‘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13] (p35)}9月1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又指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32] (p364)}上述文件证明，“革命委员会”才是秋收起义中号召民众的旗帜。在铜鼓的苏先俊曾讲道，“九月七日接安源同志通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33] (p51)}可见毛泽东在安源确实按照中央指示组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团攻占醴陵后，也曾经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醴陵分会，“牌子挂在县城东门兴贤堂，并刻有印鉴”。^{[34] (p98)}但由于革命委员会存在时间很短，活动也不多，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大，人们了解更多的是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如果简单地认为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代表了共产党的旗帜，并以此作为秋收起义政治上的旗帜来宣传，这种说法无疑有违历史事实。

可以看出，与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比，秋收起义所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前面已经删掉了“中国国民党”几个字，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已经对前一阶段复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和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但秋收起义没有明确打出共产党或苏维埃的旗帜。直到9月19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35] (p369-371)}

四、从人员情况看两次起义的区别

首先来看两次起义中的人员数量。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贺龙领导的第20军与叶挺领导的第24师以及聂荣臻、周士第领导的第25师一部分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一个营，总兵力2万多人。^{[36] (p147)}除了这些部队，还有众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南昌的青年学生、革命群众参加了起义，这些人员具体数量不是很清楚，但应当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基本分配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江西省政府以及粮秣管理处工作。而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有三支，计5000人左右：一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是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三是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37] (p12)}从人数看，两者的差距相当明显。

再从参加起义的部队人员成分看。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基本是国民革命军，都是正规部队。其中叶挺领导的部队第24、25师中许多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部队从广州北伐一路打到武汉，然后部分队伍参加二期北伐，攻进河南击败奉系军队后回师武汉，官兵军政素质较好。贺龙的部队也参加了北伐，1926年8月间他率领在湘黔边界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军长彭汉章）。周逸群在此时来到贺龙部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为提高部队素质做了大量工作。随后贺龙率部出击湘鄂，攻克多处重镇，“2月1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颇著战绩，特升任为独立15师，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受总司令部指挥”。^{[38] (p282)}后来又参加二期北伐。贺龙部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在河南击败奉军，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其领导的独立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番号。^{[38] (p322)}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中第一团是卢德铭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武器装备齐全，人员足额，军事素质较高。第二团由安源路矿工人为主体的组建，王兴亚担任团长。第三团的基础是浏阳农民义勇队，苏先俊任团长。这三个团中，第一团是正规军，第二团人员基本是工人，第三团基本是农民，所以整个部队的成分可说是工、农、兵的结合。从政治上看，这种工农兵组合的部队应当更富有革命性。不过从军事素质、武器装备和训练程度等方面来看，秋收起义的部队比起南昌起义部队当有一定差距。秋收起义中还有一个第四团，是八月下旬在修水收编的邱国轩部队。这支部队在起义打响后，临阵叛变，使得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3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昌起义部队中有一批女兵。这批女战士主要是来自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学员，7月下旬陆续从武汉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后分别加入起义军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她们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有学者考证，这批女兵共有31人，其中28人姓名已查清楚。^[40]这些女兵编入部队后，随军南下途中担任宣传、救护等工作。到瑞金后领导决定将她们集中到革命委员会中工作，每人还发了一本《救护常识》。在会昌战斗中，一些女兵到前线救护站当医生的助手，有的人还参加

战场救护工作。^{[41] (p439-440)}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后，还有几位女兵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继续转战，直到信丰整顿时才离开部队。^{[42] (p54-55)}因为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部署的军事行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党组织得到指示后，尽可能地通知了学员，一些女学员得到消息后也及时赶到了南昌参加起义。而秋收起义缺乏类似的条件，所以未见女兵编入部队的记载。

五、从结果看两次起义的异同

有学者在比较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结局差异时认为，虽然“这两次武装起义的初衷是相同的，然而，发展方向却大相径庭，有着不同结果。南昌起义部队……由于没有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采取了从城市到城市的进攻路线，违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而，主力部队于9月底、10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巨大损失。至此，南昌起义也宣告失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当起义部队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分析攻打长沙的利弊得失。经反复权衡，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把余部集中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部队退兵文家市及进军井冈山，使这支弱小队转危为安，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斗争，以农村为依托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发起新的进攻的正确轨道”。^[16]把南昌起义的结果认定为失败，并非孤立的意见，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④笔者以为将南昌起义简单地定性为失败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南昌起义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的南昌起义指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显然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解决了原驻守南昌城的朱培德部队，占领并控制了南昌，接管了银行并没收金库的现金以充实起义军的财政，建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新政权机构，将参加起义的军队整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8月1日的起义都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它以极小的伤亡完全达到了事先确定的目标，所以狭义的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广义上的南昌起义则不仅指8月1日在南昌的军事行动，还包括此后南征广东、主力在潮汕失利、朱德率兵三河坝突围并转战赣粤边整顿部队、发动湘南起义再领兵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遭遇优势敌人的围攻而失利，这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象征。然而我们知道，起义军主力虽然在潮汕汾水地区遭遇敌人重兵围攻，遭受了严重挫折，之后又在莲花山遭到敌军截击，部队溃散，但是大约1000人在董朗等率领下转移到了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合编为红二师，^{[43] (p15-21)}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另外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朱德率领下顽强阻击大量敌军围攻后，突破敌军重围，在饶平集合了起义军余部，然后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在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朱毛会师后创建的红军共同为创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成为中央红军的前身。

秋收起义的部队也曾遭到了挫折。罗荣桓对秋收起义三支部队攻打长沙曾讲道：“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44]有学者认为：“秋收起义在进攻大城市遭受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进军，保存了革命武装，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45]此说颇有道理。其实回看历史，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的转战过程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结果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在初期遭受严重挫折之后，领导人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区，建立党对军队领导，与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游击战争，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朱、毛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使得两个起义后保存的精华汇聚成一股更坚强的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④①主要有：王安平“南昌起义失败原因新探”《四川党史》1997(7)；水志刚，赵雷“南昌起义部队南征失败原因探析”《南昌高专学报》2009(1)；夏吾太“探究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新课程学习》2011(3)；王建昌，闫昌松“试论南昌起义失败根源”《才智》2011(11)。

-
- [1] 陈洪模. 南昌起义前后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钩沉 [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5, (4).
-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 107 号(特字第 85 号)记录(摘录) [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 [C].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3] 李立三报告 [A].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 [4] 熊燕.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之探讨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 [5] 陈洪模. 南昌起义前未曾召开准备起义的“庐山会议” [J]. 南方文物, 2003, (12).
- [6]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 [A].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 [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 [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8]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信 [A].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 [9] 陈居玺. 南昌起义中的一则史实—关于联络外援问题 [A].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 [10] 刘小花.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援助 [J]. 红广角, 2010, (11).
- [11] 文正再. 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比较分析 [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5).
- [12] 罗章龙. 回忆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A]. 罗章龙, 何长工, 等. 亲历秋收起义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中央复湖南省委函 [A].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4] 马也尔致湖南省委的两封信 [A].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15] 湖南马也尔报告 [A].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16] 桂玉麟.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历史经验 [J]. 江西社会科学, 1997, (7).
- [17] 金冲及. 周恩来传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18] 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A]. 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 [Z].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 [19]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 [A] . 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 [Z]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20]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 [A] . 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 [Z]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21] 潘心源. 1929 年 7 月 2 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A] .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M]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22]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A] .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M]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23] 龙正才. 秋收起义中的行动委员会 [J] . 湖南党史月刊, 1987, (9).
- [24]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A] .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 [25]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中) [M]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 [26]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A] . 中央档案馆编. 八七会议 [M] .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 [27]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 [A] .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 [28] 张国焘. 我的回忆 [M]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
- [29] 黄爱国.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若干史实研究 [J] .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4).
- [30]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A]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C]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31] 钟小敏, 黄国华. 1927 年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与三大起义比较研究——以旗帜和政权问题为中心 [J]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7).
- [32]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A]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C]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33] 苏先俊报告 [A] . 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 [Z]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34] 张明生. 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成立经过 [A] . 罗章龙, 何长工, 等. 亲历秋收起义 [M]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35]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A]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C]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36] 刘伯承. 南昌暴动始末记 [A].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 南昌起义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2009 年 6 月修订.

[37] 刘勉玉. 毛泽东与湘赣边秋收起义 [A]. 俞兆鹏. 江南文史 [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8.

[38] 刘秉荣. 贺龙全传(一)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9] 龙正才. 邱国轩团的隶属关系及其被秋收起义部队改编过程 [J]. 近代史研究, 1985, (6).

[40] 肖燕燕. 人民军队第一批女兵名录考证与探讨 [J]. 党史文苑, 2009, (11).

[41] 谭乐华. 一个女兵的经历 [A]. 罗章龙, 何长工, 等. 亲历南昌起义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42] 彭文. 革命熔炉 [A].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黄埔军校同学会编. 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 [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43] 刘林松, 江铁军. 红军第二师第四师史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44] 罗荣桓.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J]. 历史教学, 1966, (4).

[45] 万建强. 中共江西省委及地方组织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历史性贡献 [J]. 党史文苑, 2007, (6).